

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工会的创新与研究

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工会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职能转型与价值重塑。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观察，系统探讨了国有企业工会职能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组织效能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技术赋能为支撑以及协同治理为保障的系统化改革方案。本研究强调构建适应现代企业治理需求的工会运行机制，是实现国有企业工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根本路径。

国有企业工会职能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定位

传统职能范式的形成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塑造了国有企业工会特有的职能体系，其核心功能聚焦于职工生活保障与福利分配。这种以物质帮扶、文化活动组织与困难职工慰问为主的工作模式，与当时国有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形成制度性耦合。工会作为企业与职工间的纽带，在维护职工基本权益、保障企业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双重使命驱动的职能重构。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工会组织面临政治使命与经济职能的协同要求。因此,既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又要服务企业战略转型，这种双重属性促使工会职能向现代企业治理领域延伸。而当前国有企业工会章程普遍增设参与公司治理条款，职能重心逐步转

向劳动关系协调、职工职业发展等深层领域。

新型劳动关系的发展诉求。数字经济催生的灵活就业形态对传统工会工作模式形成结构性挑战。非正式用工群体或者项目制员工等新型劳动者权益保障需求的显性化，要求工会突破传统会员服务边界。然而现有服务供给与新兴群体需求之间存在的显著落差,揭示了工会职能拓展的迫切性。

工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组织运行效能瓶颈。科层制组织架构与动态化管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持续深化。在大型企业实践中,传统垂直管理模式导致决策链条繁琐,涉及多个审批层级,使得职工诉求从提出到落实需要经历复杂程序。这种制度性迟滞不仅影响紧急事务的处置时效,更在数字化时代形成服务效能落差。

职工需求结构转型。新生代职工群体的价值追求呈现多维演进特征，其核心关切已超越传统物质保障范畴。其中对于职业成长路径规划、跨领域技能认证、创新实践平台建设等发展性需求成为主要诉求方向。但现有工会服务项目仍以节日慰问、文体活动等常规内容为主,缺乏针对职业发展、能力提升的系统性支持。虽然部分企业工会尝试引入新型服务模块，但受制于专业资源不足和需求研判机制缺失，难以形成精准化的服务对接。这种供需错位导致职工参与意愿与组织服务投入之间出现效益衰减。

技术赋能的实践落差。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技术应用与组织变革脱节的深层矛盾。虽然多数工会已完成基础信息平台建设，但功能开发多局限于事务性工作线上迁移，未能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中部分智能服务平台存在功能闲置现象，职工使用频率和互动深度未达预期。特别是技术工具与管理制度衔接不畅的问题尤为突出，数据采集标准缺失、业务流程数字化改造滞后，导致技术赋能难以触及工会治理的核心环节。

工会改革创新系统化路径

构建智慧治理体系。建立工会数据资源中枢系统,整合职工图像分析、诉求动态追踪以及风险预警研判等核心功能。其中,智能算法模型实现职工需求的趋势预判，推动服务供给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介入。开发集成化移动服务平台,将法律援助、职业培训、心理健康等核心业务转化为线上可触达的标准化产品。

创新服务供给机制。推行定制化服务组合模式,构建包含职业发展指导、创新项目孵化与跨界学习交流等模块的服务资源池,从而建立职工自主选择的弹性福利机制，允许根据个体发展需求动态调整服务组合。

完善协同治理网络。构建跨职能协同工作机制，整合企业行政管理资源与工会服务职能,形成劳动关系协调的综合治理矩阵。首

先是推动建立区域性工会服务联盟,实现职业培训基地、法律咨询团队等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其次是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合作,提升工会服务队伍的职业化水平。最后为探索政会联动机制,将工会维权服务纳入地方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涵盖政策保障、专业支持、社会监督的多维权益维护生态。

新时期国有企业工会的创新转型,既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选择,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实践。面对产业变革深化与职工诉求升级的双重挑战,工会组织亟需构建兼具政治引领力、服务创新力和数字治理力的新型工作体系。通过智慧化治理模式重塑决策机制,以需求导向的服务供给突破同质化困局,借助协同化治理网络整合社会资源,国有企业工会正在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治理范式。这种创新实践不仅能够有效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更有助于将工会组织建设成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坚实纽带、企业民主治理的关键平台、产业工人权益维护的核心载体。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国有企业工会应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维护工人权益的辩证统一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工会建设的新篇章。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工会机关 王庆涛)

我校是这样做到以研促教的

目前河北遵化市的教师培训工作，客观上存在着培训类型多、培训内容广、参训学员需求不一的情况，再加上工学矛盾突出、学习时间不易保证以及学员分散不利组织管理等问题，导致有的参训教师存在着学不学无所谓的心态，从而造成此项工作要想真正开展起来，并达到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的难度。这些情况使我们认识到，要增强培训效果，除了要在规范化管理上下功夫之外，还必须加强教研和教科研工作。

近年来,为解决上述存在问题,搞好全市教师培训工作，使培训工作不断朝着科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增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校积极开展教研和教科研工作。

首先,建立校本研修制度。组建了以校长为首的校本研修领导小组，制定了校本研修计划。在此计划中确定了校本研修的目标、研修内容与形式，要求每位教师每学期要做到“五个一”，具体是指写一篇独特的教学反思、制作一篇优秀的教学设计、上一节优质课(或专题讲座)、制作一个优秀课件以及写一篇基于校本研修的论文。校本研修活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教学理念，使培训者找到了自身的优点和优势，发现了具有的缺点和劣势。这对明确今后的努力目标和研修方向,促使培训者先行实现专业化，早日成为研究型教师，从而发挥其对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引领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决部分教师对教研和教科研感到无从下手的问题,学校教科室根据中小学教学和继续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为教师编制了《遵化市教师进修学校教科教研参考选题》。此选题中既有公共专题,又有学科理论与实践专题，内容涵盖了师训内容与形式、教师成长规律、骨干教师培训、校本培训、校本教研、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新课程新教材新教法以及教学流派等各方面内容，为教师搞好教研和教科研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其次,深入培训现场和中小学听课调研，既能了解新课改以来基层教师的教学情况，也有利于对培训机构授课教师的教学进行有效指导。我校曾派 20 多名教师分为五个小组，到本市 26 所中小学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听课、发放调查问卷、座谈等形式，对本市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队伍的素质状况、教学水平、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以及对继续教育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有了解清晰,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了依据。

此外,我校还通过深入课堂听课、与学员交流、发放问卷等形式,对培训者的授课情况进行了调研。近两年来，共听取 21 位授课教师的 87 节课，并倾听了部分学员对授课教师授课的意见。我校开展针对培训者的课堂教学情况的调研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培训者看到优点和优势，发现缺点和劣势,明确努力目标和方向,促使我们的培训者能够先行实现专业化,早日成为研究型教师，从而发挥专业引领作用,优质、高效地做好继续教育工作。

再次,鼓励教师在教学中搞教科研。我校要求教师(培训者),“教学即研究”,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组织本校教师搞好试讲、评课等活动。在这项工作中,首先是搞好教材辅导。由教科室或责成骨干教师为授课教师理清教学思路，解答教材中诸如重点、难点、疑点等问题,编写辅导资料(近年已编写资料 13 本,20 多万字)。教师们把握了教材与备好课后，再组织试讲和评课活动。在试讲以及评课活动中,我们坚持教师共同评议的原则,坚决杜绝别人(包括学校领导)不着边际的“一言堂”。因此,试讲及评课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教师更好地把握教材、处理教材、用好教材,改进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师之间取长补短,相互启发,打开思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讲课水平;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自身发展。

最后,在教学中搞教科研,就必须做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进而纳入研究课题。我们特别提倡教师要敢于用创新的眼光对待教材,用创新的方法处理教材。在学校的倡导下，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发现并纠正了教材的错误和疏漏(例如,有的用例重复累赘,有的内容阐述不清,有的材料不足以及有的材料不能支持理论等等),整合了教材中的许多内容，增补了好多与现代科技发展和学员工作、生活有关的新鲜内容。教科研不仅优化了教材内容，而且为教学注入了新鲜气息和活力,提高了学员的学习兴趣,也充分体现了“教师即研究者”的新课改的理念。

教科教研工作的开展，全面更新了培训者的培训观念,更新了培训内容和培训模式,促进了我校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学研究与教育科研是教育教学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搞好了它,教学就成功了多半，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就必然得到提升。

(遵化市教研训中心、教师进修学校 孙瑞欣)

虚实共生元宇宙龙舟赛事的参与式文化生产

在数字技术重构文化形态的浪潮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经历着从实体操演向虚实共生的范式迁移。《“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开展以龙舟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特质研究，加大龙舟国际推广力度。2021 年兴起的元宇宙技术，通过数字孪生、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龙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实践场域。

元宇宙中的龙舟文化生产，不只是传统龙舟赛事的虚拟再现，更是一种更加互动与参与式的文化表达模式。通过借助元宇宙多维的数字虚拟环境，龙舟参与者能够在这些平台上以更为自主的方式进行文化创作和体验，进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龙舟文化在元宇宙中的重构逻辑

文化传承,从“实体保护”到“数字活化”。元宇宙技术突破了传统非遗保护中对物质载体的依赖，赋予龙舟文化动态传承的新可能。传统保护模式过度依赖物质实体存续与在地化实践,面临传承人断层、地域性局限等现实困境。而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的数字化保护体系,能够精确扫描龙舟器物形态、动作捕捉记录划桨技艺、智能合约存储仪式规程,形成可脱离物理载体存续的“文化基因库”。这种

技术赋能使文化实践从“实体依附”转向“数字活化”，既保障传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为描绘龙舟文化的审美意境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性。

国际传播,从“文化折扣”到“共情体验”。元宇宙技术通过具身化交互机制重构了龙舟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有效化解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解码偏差。传统传播模式下,龙舟所承载的宗族伦理以及节气时序等文化语义，常因语境缺失而产生出“文化折扣”,进而导致异质文化受众的认知隔阂。元宇宙能够有效突破此困境。首先,通过 VR 设备营造沉浸式文化情境,使海外用户通过数字分身参与虚拟竞渡,在协同划桨的具身实践中感知“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其次,通过 AI 驱动的语义转译系统将《楚辞》典故、龙舟禁忌等文化符号动态适配为本土化叙事。最后,构建全球用户共创的端午叙事网络,通过 NFT 数字藏品发行形成价值共识载体。

经济赋能,从“文旅消费”到“数字共创”。元宇宙技术通过重构文化生产要素，推动龙舟经济模式从传统文旅消费向数字协同创造升级。传统经济价值多依附于地域性文旅活动(如赛事门票或者龙舟工艺品销售等),受限于物理空间承载力与用户触达范围。元宇宙平台以区块链确权机制为基础,构建“虚实联动”的经济生态。通过数字资产开发(如 NFT 化龙舟纹样、虚拟赛事门票等)激活文化

资源的可交易性。其中,星原数艺 NFT 平台携手央视纪录片《屈原》导演、知名文化学者周翼虎,策划以屈原文化为主题的诗哲之花、酒神之歌、诗性国魂以及屈子舟等数字藏品,以致敬千年诗哲的方式，受到数艺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

二、龙舟文化在元宇宙中的挑战

信息安全，即生物特征数据化的伦理风险。一方面,元宇宙技术对龙舟参与者体态、动作及生理信号的全息化采集，使文化传承主体的生物信息面临深度暴露。虚拟竞渡中动作捕捉系统记录的肌肉协同模式，可能破解非遗传承人的独有技艺特征。而脑机接口获取的神经反馈数据，有将潜藏个体的认知习惯商业化滥用的隐患。此类数据的不可逆性与强关联性，对传统隐私保护范式提出根本性挑战。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虽为龙舟数字资产确权提供了新路径，但其开放性特征的同时也加剧了文化符号的失控风险。特别是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逻辑，难以约束跨链场景下的文化符号篡改行为。例如,虚拟龙舟纹样在迁移至不同元宇宙平台时，可能遭遇寓意解构或商业符号植入的风险，导致非遗知识产权的意义链断裂。

伦理失序。一方面,区块链的开放性与非遗“师徒秘传”的封闭性产生价值断裂。例如,智能合约将龙舟纹样转化为可无限复制的数

字资产,消解了传统技艺传承中“人-技-德”三位一体的伦理纽带，引发文化归属感与商业利益分配的深层矛盾。另一方面,元宇宙对参与者生物特征数据的全息化采集，模糊了文化传承与个体隐私的伦理界限。其中,非遗传承人的技艺特征数据可能被商业化复用，导致其身体实践从文化载体异化为技术剥削对象。

身体解构。元宇宙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对龙舟竞渡的具身经验进行数字化解构,在技术层面实现了划桨动作标准化与水动力学的数据建模。通过借助 VR 设备的运动捕捉系统，对传承者穿戴传感器完成划桨姿势训练时的腰部扭转角度、手臂摆动轨迹等生物力学参数实时量化，并通过神经电刺激模拟水浪阻力对肌肉群的反馈。这种“离身化”训练模式虽提升了技术普及效率，却弱化了肌肉记忆与文化体悟的共生关系,使非遗传承陷入“技艺可复制-经验难传承”的悖论。

元宇宙为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虚实共生的新维度，但其技术逻辑的扩张也暗含文化异化的结构性风险。未来的探索方向应聚焦于在元宇宙底层架构中植入地方性知识图谱，使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文明的赓续而非解构，从而让数字文明时代守护龙舟文化的根性与活力。

(三峡大学体育学院 杨俊杰)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基础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经历了从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的过程，这一过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个结合”不仅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必要，为中国发展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与思想支撑。现阶段党和国家正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第二个结合”仍处于进行时。这意味着，从“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实践过程,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深化发展。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第二个结合”不仅仅是表面形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结合既不是表面形式的简单的叠加或混合,也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基于内在高度契合性的互相成就的双向过程,体现了科学的理论逻辑。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回答中国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

一、社会观的高度契合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一直追求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礼记·礼运》中有明确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强调的是贤能选拔的标准、公

平正义以及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种社会理想被中国古代儒家学派视为理想社会的典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公正、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状态与“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以及最终实现“公天下”的目标高度一致。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人民观的高度契合

千百年来,从最早《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再到唐太宗的《民可畏论》等代代相传的民本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存在价值观契合，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有着深刻统一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党逐渐意识到人民的重要性，找到了革命的目的在于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革命能依靠的也只有人民。在新时代，党恪守初心使命,高举“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想人民之所想、思人民之所思，充分调动起人民的思想主动性和积极创造性，集人民之伟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辩证法思想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独特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机制，其中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些规律不仅是分析事物发展普遍规律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解世界变化发展的关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无论从内容还是本质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例如,《周易》中强调“变易”与“不易”的统一,《道德经》中的“变中有常,常而又变”的思想都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既包含变化,又保持一定稳定性的一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相契合。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观念,如阴阳和合、中庸适度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世界的变化发展规律高度契合。

四、自然观的高度契合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是有机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改造自然,同时也受到自然的制约和影响。这一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以及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等观点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只有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与此相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观念,提倡适度消费和